

特載

綠化紅色中國——美國的梦想能實現嗎？

（本文作者 Peter Van Ness 為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副教授）

范乃思

約拿旦·斯賓賽 (Jonathan Spencer) 在其著作「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一書中，曾以下列一段話描述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代西方在華顧問與中國人相處的遭遇：

他們都經歷到相同的刺激和危險，抱着相同的希望，學習克服相同的挫折，並以坦誠和迂迴雙重方式行事。在日常作為上他們披露自己的心靈，反映出西方的社會範型，而又顯現了中國人價值觀念的特徵。中國人却以同樣強烈的意志告訴西方人，優越感具有其曖昧性質，利他思想與剝削他人之間具有難於劃分的界線。

近來美國各報章雜誌普遍流行着一種看法，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大陸復辟，社會主義走向墳場。歐菲爾·西爾 (Orville Schell) 曾在「紐約人」雜誌 (New Yorker) 上絕望的指出，中國大陸可能將失去毛澤東思想的「國家性質」。「華盛頓郵報」也曾形容中共總理趙紫陽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中共領導人。在訪美期間，趙某曾在華府一次盛大的午宴中向美國商業界領袖闡明中共向西方開放門戶的「客觀需要」，同時保證永遠不再關閉大陸門戶。

過去廿年來，美國學術界中一些研究現代化問題的學者曾肯定推測中國大陸將出現着重實務主義的「新生代」領導人，屆時美國與中共之間將有機會獲得真正的妥協。趙紫陽與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是否屬於他們所期待的「新生代」領導人呢？美國一向夢想塑造一個能夠接受美國規範的中國，是否正在成為事實呢？

美國的此一夢想來源已久。自從一八〇〇年代美國與中國首次發生接觸至趙紫陽訪美期間，許多美國的「中國通」，包括老一輩和年青一輩者，都夢想把中國引入到他們的羊欄之中，這些人包括基督教傳教士、冷戰衛道者、自由派學者、野心資本家、玩弄權力政治的馬基維里的信徒們，以及心地善良、有優越感、且欲改良人類生活的人士。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負責處理美國亞洲政策的美國戰略家們，一向以如何改變中國作為最優先戰略目標。他們曾圖以軍事力量擊敗中共，自內部顛覆中共政權，或引誘中共自我改造。自一九六〇年代起，美國中國事務專家爭論的政策焦點集中於如何選擇最佳方案，使中共歸順美國。尼克森終於採取比這些專家們更為大膽的方案，在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二年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達成妥協，並形容此舉已經「改變世界」。

本文旨在探討美國與中共當初達成妥協的一些主要特徵，並從兩個階段剖析其影響。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七一年至毛澤東死亡

爲止。第二個階段從一九七八年中共開始推動四個現代化至目前。最後一節探討美國對中共馴服戰略成敗的可能性。

第一階段：越南的急務與蘇聯的威脅

西姆·赫斯（Seymour Hersh）在其近著指出，首先計議主動與中共展開關係正常化的是尼克森，而不是季辛吉。赫斯在「權力的代價」（*The Price of Power*）一書中，一方面挑出季辛吉的缺點，另一方面貶低了季辛吉自誇自耀的成就。此點赫斯所言不虛。

尼克森在一九六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前一年在「外交季刊」所刊載的一篇文章中，已經闡明了他對中共的基本戰略概念（而此時季辛吉則仍然支持納爾遜·洛克菲勒競選總統）。當時正如許多美國分析家一樣，尼克森試圖想出越戰後美國的亞洲政策。很明顯的，越戰破壞了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構想，無論以何種方式解決越戰，美國的亞洲政策非更改不可。

尼克森在一九六〇年代期間仍認爲，亞洲國家共同面臨來自中共的威脅。同時，他認爲資本主義制度是亞洲的救星。他也曾經形容日本、香港、臺灣、南韓及新加坡的經濟成就是一項自明的命運，證明亞洲國家在爭取西方科技和組織方法上已經邁向新的里程碑^①。

尼克森預測在越戰結束之後，美國將不會以相同的理由從事類似越戰的干涉行爲，同時美國作爲國際警察的角色也將大受限制。因此，他認爲美國任何亞洲政策終將必須面對中共的事實。尼克森並不主張以姑息面對中共的威脅。相反的，他認爲美國必須認清中共當前及潛在的危險，並採取因應措施。不過，他認爲美國不能永遠將中共摒棄於國際社會。

尼克森是想以馴服中共的直接方法來解除中共的威脅。誠如他所強調：「在中共改變之前，世界難能獲得安全」。他指出：在美國有能力影響國際事務的範圍之內，美國的目標必須是誘導中共改變。在做法上，我們要勸導中共必須改變，告訴中共它的帝國主義野心難能得逞，放棄對外冒險才能符合它的國家利益的需求，同時它必須回頭致力解決內部問題。

尼克森認爲，如果美國的長遠目標是要將中共重新納入國際社會，美國就需要對中共採取施壓和勸服的積極政策，同時結合亞洲國家的力量以維持和平，以積極性政策將毛澤東思想之毒素加以清除。

尼克森所提方案是軟硬兼施的政策，這意味着美國一方面必須制止中共向外侵略，另一方面必須感化中共。亞洲的現狀將在美國一方面馴服中共，另一方面領導亞洲盟國對抗中共向外侵略意圖之下，得以保存^②。

然而，事實的演變證明，美國與中共終於在一九七一年達成妥協，並非基於美國的實力，而是基於美國決心擺脫越戰；也並

註①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67, p. 118.
註② 同註①, 111-112, 111-112頁。

非基於中共嚮往美國的誘餌，而是基於中共懼怕蘇聯的威脅。早先許多美國分析家肯定指出，美國要等待毛澤東死後，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接棒，才有希望與中共達成妥協^③。然而，結果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動展開與美國和解。從某方面來看，毛澤東展開對美的和解與尼克森推動美國對中共的和解，有其相同之處。毛某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具有膽識和眼光試圖展開如此激進的政策。同時毛某具有意識形態上的資格和權威，使得他贏取內部政策爭論，執行及維護如此極烈的政策轉變^④。就如此，一向反共的尼克森和馬克思革命家毛澤東，在各自尋求不同的目的上，終於和平相好。

美國的戰略考慮主要有三點：(一)解決越戰問題；(二)促使中共與蘇俄相對立；(三)削弱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性影響，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影響。當然，其他重要考慮是尼克森希望啓開中國大陸門戶增強他連任的機會。

解決越戰成爲尼克森政府不得不優先考慮的問題。尼克森於一九六八年入主白宮時，美國正處於自由世界「經濟大恐慌」以來最沉痛的政治困境之中。越戰所引發的國內政治分歧，導致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化。要求結束越戰的政治口號出現於全國各個角落。在第三世界的眼中，美國干涉中南半島的軍事行動被視爲帝國主義的表徵，嚴重損害了戰後美國標榜的道德規範^⑤。無論如何，美國必須尋找出路，擺脫越南，但又必須保持不敗的形象，也就是尼克森所謂的「光榮的和平」。中共向河內施壓力是保證這一目標成功的最大關鍵。雖然蘇聯也曾表示願意協助美國以談判結束越戰，然而，如無中共充分合作，越戰似難終止。美國尋求中共協助終止越戰所需付出的代價包括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必須讓步。誠如赫斯指出：「尼克森和季辛吉在臺灣問題上讓步，俾換取中共支持以談判解決越戰……雙方都要求對方出賣一個盟友」^⑥。

至於美國的第二個戰略考慮因素——促使中共對蘇聯互相對立——雖然中共與蘇聯緊張關係在六十年代已極明顯，但至一九七〇年之前，美國仍未發展出從中獲利的全球戰略。尼克森相信，美國展開與中共接觸將能使美國在三角關係中善用中共與蘇俄之間的分歧。

美國的第三個戰略目標，同時它也是比較未受矚目的戰略目標，是尼克森在一九六七年的「外交季刊」專文中強調要清除毛思想毒菌在國際上的影響。在當前美國與中共「蜜月」期間，欲想回顧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對毛政權的看法，尤爲困難。然而，廿

註③ Lucian W. Pye, "China in Contex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67, pp. 229-245.

註④ 關於蘇聯是否曾經對中共構成嚴重威脅(例如蘇聯會考慮對中共發動軍事攻勢)，或者是林彪透過運用反毛的工具刺激或捏造「蘇俄的威脅」，那是見仁見智的看法。不過，毛澤東與周恩來對蘇聯威脅的認知，並非虛構。參見，Seymour M. Hersh, *The Priz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3), Chapter 26; Yao Ming-le, *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 (Knopf, New York, 1983); 及 Richard Wich, *Sino-Soviet Crisis Politics: 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Harvard, Cambridge, 1980).

註⑤ Ronald Steel, *Par Americana: The Cold War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Counter-Revolution*, (Viking, New York, 1970).

註⑥ Hersh, *Prize of Power*, p. 367.

年前，美國決策者的確深感中共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和激進意識形態的威脅。當時中共的全國總生產量約佔美國全國總生產量的十分之一，中共必須養活的人口多出美國四倍，且中共的軍力無法渡過臺灣海峽，更談不上威脅北美本土。儘管如此，前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九六一—一九六八任期內，曾主張美國建立反彈道飛彈系統用於防範中共預期增強的軍力，雖然實際上中共於一九六四才首次引發核子試爆，而至今為止，中共擁有的核子武器和飛彈投射系統仍比美國相差太遠^⑦。

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決策者深懼中共的激進政策將影響全球形勢，並非空穴而來。美國一位分析家曾寫道，當我們談到共黨的侵略性時，並非僅指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或傳統軍事攻擊，而尤指共黨的革命戰略和支持此一戰略的軍事力量。他指出，中國共產主義自認已經為展開「民族解放運動」和推展「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樹立了楷模。他的結論是，中共在各個不同層面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攻勢，主要依賴中共發動的心理作戰^⑧。毛澤東的作為的確曾令美國領導人懷疑，美國到底是不是真如毛所說的，是個「紙老虎」！

從中共方面而言，與美國達成妥協對中共具有若干重大戰略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蘇聯構成嚇阻的作用。理查·威茲（Richard Wich）曾形容中共與美國的妥協是基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地緣邏輯的變化。他發現中共外交上的轉變導源於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侵入捷克斯拉夫，以及布里茲涅夫主義所涵蓋的有限主權的原則。中共外交上明顯的變化包括：視蘇聯為國際上主要敵人，與美國達成妥協，與日本重修和好，以及改變與越南、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的關係。威茲從各個不同的分析層次歸納中共決心與美國妥協的因素，其中包括國際政治體系，中共內部派系鬭爭，中共與蘇聯雙邊關係等^⑨。然而，事實上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中共與美國和解的決心。

我們往往忽略了，中共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期間曾經同時採取對抗兩超級強國的戰略。誠如威茲和其他分析家所曾指出，自從蘇軍鎮壓「布拉格之春」，摧毀捷克改革運動之後，蘇聯代替了美國，成為中共心目中威脅它安全的最大敵人。不過，至七〇年代末期，中共仍然視美國和蘇聯為主要敵人。從中共的觀點而言，毛澤東、周恩來一邊與尼克森、季辛吉一邊所獲得的協議，等於為中共打開了一條路，作為因應蘇聯的威脅，同時也因應兩超級強國的威脅。中共與美國達成妥協不僅對蘇俄產生嚇阻的效用，同時也一舉而拆除了自韓戰以來美國在亞洲建立的反中共聯盟體系。尤有進者，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意味着華盛頓不再試圖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或阻礙中共加入國際組織以及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宣

註⑦ Robert S. McNamara, *The Essence of Security: Reflections in Office*,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8), Appendix I.

註⑧ Franz Michael, "A Design for Aggress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January-April 1971, p. 63 and 67.

註⑨ Wich, *Crisis Politics*, c. g., p. 93.

佈他即將訪問北平之後，在短短三個多月裏，聯合國大會於同年十月廿五日接納中共，排除中華民國。這件事充分反映了美國上述政策轉變。北平與華盛頓的妥協也便利中共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其結果是，中共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取得了強有力和合法地位，使得美國無法在往後的日子裏再否定中共的合法地位，或指認中共為「非法」的政權。同時也將使美國很難重新建立類似廿年前的反中共聯盟體系。

最重要的結果是，全世界各國都清楚看到（少數美國人例外），由於美國撤出越南是美國與中共達成新安排的部份協議，因此，它象徵着美國騎士時代的結束。美國放棄了擔任國際警察的角色，它的霸權威力已逐漸減退。

美國與中共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妥協及其影響

大體而言，美國與中共雙方達到了彼此妥協的目的。中共已不再感受來自兩超級強國的威脅^⑩。它在國際上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中華民國則處於更加孤立的外交逆勢^⑪。同時中共也注意到，美、蘇雙方的核子均勢正重新改變世界權力形勢，而美國正執行尼克森含糊的關島原則，逐漸擺脫干涉國際事務。事實上，北平一直擔心美國的實力較蘇聯直線下落。這種憂慮在雷根上台後決心重整美國軍力時，中共才鬆了一口氣。

在美國方面，與中共妥協的結果，使得華盛頓在撤出越南的談判（一九七三年元月在巴黎結束）與一九七五年共黨捲席中南半島之間，獲得了「適當的時間間隔」，同時也獲得了新的戰略機會，而能在三角關係之下促成中共與蘇聯互相對抗。這是辛辛吉所嚮往的權術外交。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當選連任。但不過兩年因水門案件造成的政治壓力而被迫罷官。

尼克森早先試圖清除毛澤東思想毒菌的構想也頗為成功，起碼毛思想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及中共作為民族解放革命的楷模已經大為減色。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宣佈他將訪問大陸時，曾在各地毛派份子中引起大震盪。他們認為中共與世界首要帝國主義強權的美國言歸和好，不僅違背了共黨原則，同時也違背了中共自己於一九六〇年代強調建立反美國國際統一陣線的共同使命。

註⑩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明顯指出，中共的國防開支反映了中共安全上的無憂無慮。這份報告顯示，一九六一——一九七一年間，中共國防預算直線上升，至一九七一年中共與美國展開妥協之後，開始遽急下降，至一九七九年才恢復一九七一年的開支，因為一九七九年中共需要增列預算以因應中共與越南交戰所需額外資源。自一九七九年之後，中共國防預算又再度下降。參見，Ronald G. Mitchell, "Chinese Defense Spending in Transition,"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art 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82), pp. 605-610.

註⑪ 關於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之後，北平在聯合國及其他附屬機構中的活動，請參見 Samuel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79).

。阿爾巴尼亞人民黨第一總書記賀薩（Enver Hoxha）對中共的批評最為強烈。阿爾巴尼亞爲了本身反蘇俄及反南斯拉夫的原因，曾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甘爲中共在國際上獨一無二的支持者。賀薩指責中共停止援助北越盟友。他對中共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在歡迎尼克森的宴會中演奏「美麗的美國」（America the Beautiful），曾經在他的日記上評述說：

宴會中的樂隊竟然演奏了「美麗的美國」這首歌曲！那是屬於百萬富翁和千萬富翁的美麗的美國！那是法西斯和野蠻帝國主義的美國！那是屠殺越南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鎮壓人民自由的美國……然而他們在北平却以熱誠心懷爲這個美國歌頌。受感動的尼克森在致答謝詞時告訴周恩來說：「我一生從未聽過美國歌曲在異國演奏的如此美妙」^⑫。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間，中共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主要有二個動向。其一是，支持民族解放革命運動。其二是，與一些願意和北平建交並支持北平最起碼政策目標的非共國家，建立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中共一九五六年開始推動的經援計劃，目的在維持及加強上述關係。至一九六〇年代期間，中共此項雙管策略持續不變，雖然偶爾受文革動亂的阻礙。

然而，中共此一外交政策型式在一九七一年中斷了。作者與賴祖先生（Satish Raichur）在最近共同合作研究中發現，中共自從與美國達成妥協之後，已經大量削減它支援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同時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政府間關係，增加經援給願意和北平建交的國家。（見圖表一）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之後雖有更多的國家接受中共經援，中共的經援總額却相對減少。此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中共開始儲備資金以推動內部經濟發展，尤爲顯明。（見圖表二）

第二個階段：四個現代化

由於美國與中共各面臨領導繼承人的問題，雙方關係直到卡特上臺之後才步步上升。這時毛後的中共新領導人已鞏固勢力，「四人幫」也在一九七六年被打倒。從一九七八年起，隨着卡特決心要與中共建交及鄧派開始在「四化」之下推動社會主義式的市場經濟，包括允許外國人在大陸從事直接投資，雙方關係更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⑬。同時，自一九七八年起，中共決心派遣數百位（後來是數千位）學生和學者到資本主義國家進修。從此中共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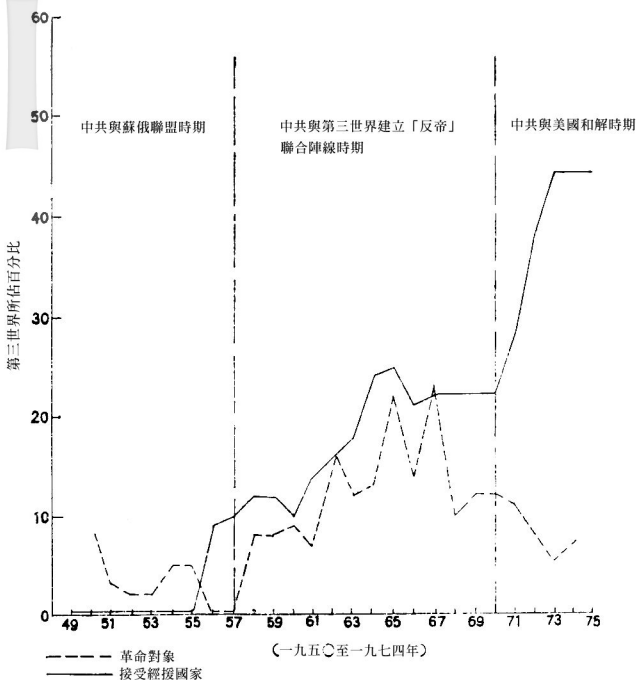
雖然中共執行「四化」的領導班子繼續喊出「自立更生」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口號，但事實上，自一九七八年起，中共却有系統的執行了毛澤東所禁制的政策，背棄了毛某所謂自立更生的本意^⑭。除了派送大批留學生和學者前往資本主義國家進修之

註⑫ Hersh, *Price of Power*, pp. 495-496 同註⑩ 頁 376-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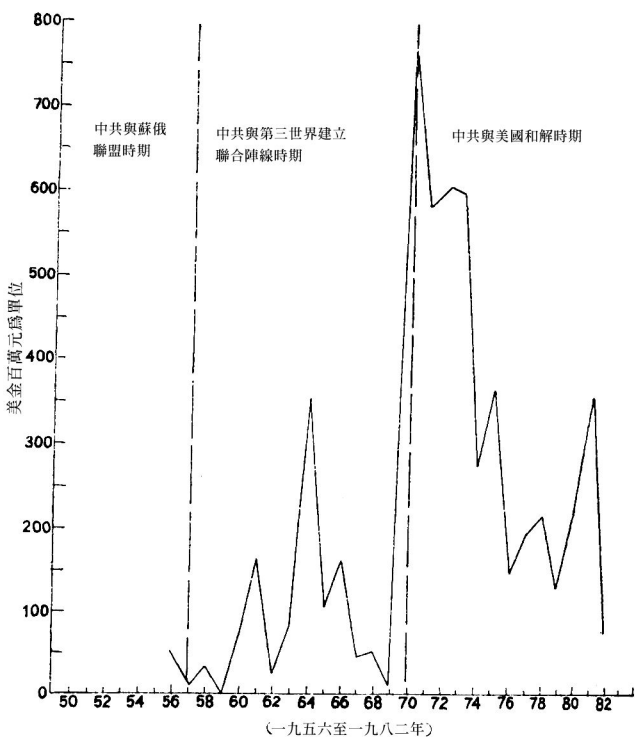
註⑬ Peter Van Ness and Satish Raichur, "Dilemma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Strategic Lines in China, 1949-1981,"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January-February 1983, pp. 2-15.

註⑭ 穆時 Mu Youlin, "More on China's Independent Diplomacy," 及「北京週刊」, January 30, 1984 轉載趙紫陽在加拿大國會的演講詞。

圖表一 中共與第三世界之關係——中共支持的革命及經援（本圖表顯示中共革命對象的獨立自主非共國家及積極接受中共經援的第三世界國家每年獲援的百分比。）



圖表二 中共每年對開發中非共國家的經援總額。（本表係作著與 William McAninch 共同研究所得結果。）



外，其他新政策尚包括：(一)與國際間多國公司在大陸合資聯營企業；(二)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此兩個組織是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之間主要的經濟橋樑；(三)爭取國外長期貸款；(四)發展大陸觀光事業；(五)進口外國消費品，供應大陸市場需要；(六)組成公司推銷中國大陸勞力和技術人員，從事海外由多國公司或外國政府承包的工程。凡此政策，如以毛澤東的觀念看，將必然導致中共依賴外國政府，甚或將犧牲中共社會主義制度現有的社會生產關係。

上述新的政策已經開始產生果實。例如，趙紫陽訪美時指出，過去五年間，中國大陸吸收了一百廿億美元的外資，推動或成立約二千個由外國直接投資的工程計劃和企業^⑤。權威性的「中國經濟評論」(China Business Review)也曾報導，世界銀行已經提供、或者正商議提供廿六億五千萬美元貸款給中共^⑥。自一九八〇年起，中共成立了若干經濟特區以吸引外資。此與臺

註^⑤ China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84, p. 29.
註^⑥ 同註^⑤第卅八頁。

灣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作法如出一轍。「北京周刊」曾報導說，直到一九八三年末期，最大的經濟特區——深圳——已經和外商及華商簽訂了二千五百六十個協議書，總值一百卅二億二千萬港幣，其中廿七億四千萬港幣已撥用^⑭。根據「北京周刊」報導，中共四十二家公司在一九八三年中已經和四十多個國家簽約，提供勞力和技術人員在海外承辦外國政府及多國公司的工程^⑮。因此，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可謂逐月累進，其中包括貿易、貸款、投資、商標許可、外海石油探勘、資訊科技交易，具有軍事用途的「雙用科技」協定以及情報交換協定。

一九八二年尼克森在慶祝他歷史性訪問中國大陸十週年時，曾經肯定了當前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展望。他強調指出：「中國今日似乎已成功的變成更中國化而遠離了馬克思思想，採納了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獎勵措施，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如果他們繼續沿着此方向前進，他們將可在廿一世紀成爲世界主要經濟強國」^⑯。中共當前清除毛思想毒菌的重點朝向其內部的社會制度，而鄧小平一夥人似乎正在這方面進行一種差強人意的改革。

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基本上欣賞中共推動「四化」政策（包括中共新的國內與國外經濟計劃），認爲中共早就應該採用合乎常理的經濟救藥。按照他們的看法，任何一個低開發國家如想達成經濟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循，那就是採用資本主義經濟措施並與世界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合作。他們認爲中共終於已充分了解此一事實^⑰。

當前美國與中共的文教交換合作關係頗有進展，其所涉及的範圍包括都市計劃、實驗物理學及電視教育節目等。然而，這些文教交換合作關係的交流並非平行進行。例如，在教育交換計劃之下，已經有數千名中共學生和學者在美國深造或從事研究工作，却只有數百名美國學者在中國大陸從事教學或研究。美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普力威（Kenneth Prewitt）及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專家奧克森柏（Michel Oksenberg）曾在一份報告書上辯稱，美國與中共文教合作交流沒有平行進展並不重要。他們所持的理由如下：

我們必須認清，美國對中共開放科技之門戶，有許多理由，而不是僅僅替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家開路。它的廣泛意義還涉

註⑭ 「北京週刊」，一九八四年元月廿三日，第廿八頁。

註⑮ 「北京週刊」，一九八四年元月卅日，第十一頁。

註⑯ 「紐約時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八日，第E十九頁

註⑰ 請參閱 Robert F. Dernberger, "The Chinese Search for the Path of Self-Sustained Growth in the 1980s: An Assessment,"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p. 19-76; Dwight H. Perkins, "The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ichard H.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cene*,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81).

及國家戰略利益及認知許多問題是超越國家領域，而需要各國的科學家們共同解決^②。
爲什麼美國急於培養中共下一代的科技人員呢？直接了當的答案是：爲了改變中共。

馴服中共註定失敗的原因

自從尼克森展開美國馴服中共的政策之後，其早期重點目標是摧毀中共鼓動世界革命的自我標榜和毛澤東思想的毒菌。因爲，在一九六〇年代期間，中共上述激進政策似乎已威脅着美國在亞非地區的勢力基礎。此一早期目標已經成功。例如，第三世界的革命造反組織曾視毛澤東對尼克森的妥協是一項出賣道德原則和共同政治目標的行爲。

一九七八年象徵着美國馴服中共的政策進入了第二階段。此時中共內政政策發生變化，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領導階層決心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合作，俾加速經濟發展。這一發展，更提高了一些美國人的雄心。美國第二階段政策，今（一九八四）年已進入第五個年頭。今年元月趙紫陽造訪美國，雷根總統也將啓程訪問北平。美國國內有許多人抱着奢望，希望中國大陸社會制度產生基本變化，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些人也盼望，中共終將溶化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使它變爲美國長期的友好和合作夥伴。雖然北平不斷喊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口號，中共似乎已經開始遵循美國的規則。

那麼，何以說美國馴服中共的政策將註定失敗呢？主要基於三個因素：歷史，文化與能力。事實上，其中任一因素就足夠註定其失敗命運。

就歷史因素而言，今日那些幻想馴服中共、將西方文明引入中國大陸的美國人，他們不妨仔細研讀斯賓賽所著「改變中國」一書。這本書將明白告訴他們，何以他們的祖先在試圖改變中國的努力上，效果不佳。斯賓賽詳述那些自命不凡的在華外國顧問們的挫折，這些人包括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和五十年代的俄國技術顧問人員。中國人有一套吸其所需、摒其所惡的作法，尤其是針對那些外來的、用以控制或操縱他們的設計。中國人繼承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悠久而光輝的歷史傳統。無論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法西斯信徒、中國國民黨或其他中國人，他們對於生爲中國人、中國的過去和中國的未來，都有強烈的意識。尤其是經歷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十八世紀和本世紀初期的凌辱，中國人似乎不會再讓外國人爲他們決定重要的選擇。

就文化因素而言，美國文化對中國人毫無吸引力。一個普通的大陸老百姓，當他觀看美國警匪打鬥的電視影集時，他對美國社會的印象是又亂又糟、無法無天的一個社會。理查·索羅門（Richard Solomon）曾經撰寫一本書，解釋中國人對於「亂」

註② Kenneth Prewitt 主編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American Human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1982), p. 46.

的恐懼，強調中國人堅持凡事必須有秩序的人生觀^②。而過去廿多年來，美國給中國人的印象就是漫無秩序的社會。他們認為美國的犯罪率高得驚人，美國家庭支離破碎，性關係徹底雜亂，教育失敗到了可悲可恥的地步。總之，中國人覺得美國文化無可取之處。他們只想學美國的科學、生產技術及活力，不要美國的文化根本和社會制度。

就能力的因素而言，尼克森在前述「外交季刊」一文中所舉的比喻大體上是正確的；不過，美國的能力並非他廿年前所想像的。那時候，美國與蘇聯正和解相處。尼氏辯稱，二次大戰後，美國與其西方盟友創造了新的國際環境，迫使橫蠻的蘇聯採取妥協姿勢。他說，當蘇聯知道它非變不可時，它終於也變了。因此，尼氏認為美國同樣可以迫使中共改變。

然而，今日當蘇聯的核子力量已與美國平行時，莫斯科已經改轍換道，不再與西方妥協。但尼克森的判斷錯誤，無形中給予我們一些啓發性的類比道理。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在其著作「新階級」(The New Class) 中曾警告西方國家說，在像蘇聯那種制度之下的領導階層，當他們覺得國力不足時，在外交上也許會採取防守姿勢，甚至採取妥協政策。然而，一旦他們開發了國家資源，增強了進行干涉的能力，就像蘇聯目前那樣，他們就不會繼續妥協了^③。

註②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University &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1).
註③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Praeger, New York, 1957), e.g., pp. 178-179.

五次圍剿戰史 (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平寄 美金 八元

國外：航空 美金 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